

#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中国特色金融现代化道路

王丹莉<sup>1</sup> 王曙光<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9; 2.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两个结合”作为未来金融工作的战略性指导原则, 值得在思想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进行深入解读与落实。中国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 积淀了丰富而灿烂的经济伦理与金融文化。“见利思义”“义以生利”的儒家传统义利观, 以及千百年来逐步演化出来的强调诚信、道义的经济伦理与金融哲学, 至今仍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现实意义。文章尝试系统梳理中国优秀传统商业伦理与金融文化, 并为当下中国金融发展和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 金融现代化; 金融高质量发展; 金融强国; 金融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F8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4) 08-0075-08

## 一、引言 “两个结合”对于建设现代化金融强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2023年10月,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 作为国民经济血脉的金融体系备受关注。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 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sup>①</sup>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提出, 既是对我国以往金融发展道路的精准总结, 也是对我国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战略性、前瞻性要求。两个结合作为未来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国金融工作的战略性指导原则, 应在思想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对其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解读与落实, 以呈现“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并厘清其实践路径。

事实上, 中国在历史悠久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过程中, 积淀了丰富而灿烂的经济伦理与金融文化。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亦旧亦新、连续不断的文明, 在其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展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重大项目(2021mgczd008)。

作者简介: 王丹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新中国经济史、近代金融史;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中国发展战略、金融文化与金融伦理学。

<sup>①</sup>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金融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激发信心动力》, 《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日, 第1版。

现出坚韧性、创新性和适应性。金融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表现出同样的特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而又日新又新地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发掘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时代进行适应性转化和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金融现代化道路、建设现代化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伦理和金融文化的支撑，从“两个结合”出发，中国的金融体系才会行稳致远，助力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今天中国的金融发展和改革正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入手，梳理我国传统经济商业伦理入手，找到中国金融现代化之“根”、金融强国之“源”。

## 二、理解金融文化的内涵 “三个层次”说

### 1. 金融文化的内涵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升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以中华优秀金融文化为指导，尤其需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为基础的经济义利观和金融伦理作为指导，引领金融企业实践，提升金融业总体竞争力，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这一概念因其丰富的内涵而难以被界定，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是人类努力创造的结果之总和”，包含思想、学术、制度、礼俗、艺术等方面。<sup>①</sup>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是群体生活持以进行的一种方式”，社会和个人是可见的实体，而“文化是看不见的抽象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驱策着人接近它”。<sup>②</sup> 可见，文化是一个地域的人类群体所有生活方式的总和。而金融文化是不同国家、不同类型金融机构所有经营行为、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的总和，一个金融机构的所有金融经营行为和管理方式都体现其文化，体现其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这些金融文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从更深层次来说，金融文化是一切金融交易行为背后隐含的人类价值观（伦理观）的总和，是在金融体系自身演变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价值（伦理）体系，而这些价值观（伦理观）又影响着金融本身。<sup>③</sup>

### 2. 考察金融文化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金融文化是显性的物质文化，是一个金融企业的外在形象，包括具体标识、外观识别系统、营业场所的建筑和内部设计所展示出来的企业形象等，是可以具体被感知的层面，也是初级层面。

第二层金融文化是行为或者制度。一个金融企业在经营运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行为或者一整套制度体系，就是其行为或者制度文化。这种行为或制度大到经营管理，小到为客户提供具体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如银行的存贷款制度、风险控制制度以及金融业各种制度安排。有些行为或者制度文化可以被直观地观察到，如金融从业人员的礼仪行为举止，有些则不能被直观地观察到，如软性的内部管理制度。

第三层金融文化是金融哲学和金融伦理，这是金融文化的最高层次。它是隐性的，属于理念的范畴。第一层和第二层金融文化都根植于第三层金融文化中。一个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或制度文化，都是金融哲学和伦理文化的体现。金融哲学和伦理虽然不容易被认知，但其作用深刻而持久，能够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 三、源远流长的中国金融文化

中国的金融业与金融文化历史悠久，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① 张岱年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载《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② 费孝通 《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③ 王曙光 《培育金融集体人格》，《金融文化》2023年第5期。

第一个阶段是古典阶段的金融文化发展时期。从先秦到鸦片战争以前，可称为金融文化的古典阶段。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较成熟的金融货币体系，从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专营银钱业和借贷的公私机构，到唐宋的账局、银号、钱铺等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时期，我国金融业发育较早，类型多样，形成了历史悠久的金融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商业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实物借贷和货币借贷开始兴起，且货币借贷逐渐超过实物借贷。货币借贷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更方便，不像实物借贷那样受局限。这一时期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发展很快。在国家信用方面，战国时期的《周礼》记载了我国早期国家信用的发展情况。《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关于“掌以市之征布”的泉府对民间进行赊贷的记载，“赊”是不取息的借贷，而“贷”则是取息的借贷，“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周礼·天官·冢宰》）“以国服为之息”即当时的官方借贷利息。中小宰的职责之一是“听称责以傅别”，即以“傅别”为依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傅别”是借贷双方持有的凭证，代表借贷双方的契约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有了“傅别”，就有了契约理念，就有了守信思想，一切信用活动的核心就是守信，这是最初的金融文化。

政府的赈贷以及民间包括高利贷在内的借贷行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但名称、方式不同。南北朝时期，信用形式包括信用贷放和抵押贷放，这一时期由于佛教盛行，寺院金融得到了迅速发展，“僧祇粟”“质库”反映的都是寺院的放贷行为，而寺院中的“寺库”“质库”是中国最早经营抵押放款的金融机构。<sup>①</sup>后来的典当业亦由此发展而来。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都推动着金融的发展，唐代不止寺、观可以代为保管信众的钱财，信誉好的大商铺也可以接受商户存款，并有类似支票的支付方式，即存户凭书贴可命令商铺将其所存财物支付给第三方，还出现了代人保管财物或代为运用的“柜坊”。<sup>②</sup>汇兑业务也于这一时期产生，为了减少现金运送带来的风险和麻烦，唐代已可以持凭证异地取款，“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新唐书·食货志四》）。“飞钱”可以实现异地汇兑，只是这时经营汇兑业务的并不是专门的信用和金融机构，而是军、使、商人或度支、户部、盐铁等政府部门。到了宋代，既有官营的汇兑，也有私营的汇兑。民间有从事抵押放款的质库、从事银钱兑换业务的“金银铺”、从事“有价证券”交易的“交引铺”等各种信用和金融机构，规模十分可观。在长期的演进中，专业的信用与金融机构逐步发展起来。明代以银钱兑换为主业的钱铺（又称“钱店”“钱肆”）发展很快。钱铺是钱庄的前身，苏州等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很多钱铺。早期的钱庄放款和存款业务的规模较小，至清代时，钱庄的规模已十分可观。乾隆年间，上海就出现了钱庄的同业组织钱业公所，钱庄不止经营货币兑换，存款放款以及通过庄票进行商业融资都是钱庄的重要业务。<sup>③</sup>

第二个阶段是近代以来金融文化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启蒙和发展。从鸦片战争前后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是中国近代金融文化的奠基、萌芽与探索时期，蔚为大观的钱庄和票号是这一时期民间金融机构的重要主体。民国时期，钱庄的业务开始在全国大量扩张。票号和钱庄均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晚清时期，票号与官府保持密切关系，实力雄厚，在近代金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对促进当时的进出口贸易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19世纪后期，票号固守传统的经营方式而不能与时俱进，最终在外国银行和本国银行的挤压下慢慢丧失竞争优势，逐渐式微萎缩，多数票号停业倒闭，1921年，全国仅存5家票号。<sup>④</sup>

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启蒙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具

①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第123、第127-128页。

②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0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编《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829页。

有官方背景的华资银行之外，以“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为代表的私营银行发展迅速。银行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银行的数量增长很快，各地银行间的同业组织——银行公会也随之成立。作为现代意义的金融机构，银行与传统的钱庄、票号在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动荡和夹缝中成长的华资银行，只得在内部制度和业务经营中不断推陈出新，在模仿、承袭与突破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然而，随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华资银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sup>①</sup>

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启动，中国金融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50年，政务院做出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一涉及财政、金融、贸易等诸多领域的决定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塑造以及经济建设的展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历了公私合营之后，包括私营银行在内的私营银钱业退出历史舞台，和国有银行一起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统一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既发挥央行职能，也具有商业银行职能，以央行为核心的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政府控制资源配置和资金使用的重要工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的银行业虽然机构单一，但规模很大，在大一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呈现高度计划化、集中化的特点。这一阶段，银行业为中国工业化的全面启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都离不开银行业的大力支持，而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建立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有银行发挥了极大的支撑作用。这一时期的金融文化为国家赶超战略和中国的工业化目标服务，深深地打上了新中国的国家文化烙印，为后来中国特色的国有银行金融文化奠定了基础且影响至今。

第四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深化的时期，也是金融文化体系全面形成的时期。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业越来越富有活力，金融机构也呈现多样化。伴随着中国初级工业化的基本完成，金融文化也向现代金融文化转型。这一时期的金融文化呈现鲜明的特点，国有银行的金融文化和民营性质的股份制银行的金融文化并行不悖，两种银行文化各有特色又殊途同归。国有银行承担着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责任和民众福祉的人文关怀。金融关系国家安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国家金融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定的支撑和保障。国有银行的责任与担当已从企业精神上升为国家精神。同时，民营性质的股份制银行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企业精神和文化。

中国的金融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金融业以及金融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一方面，金融文化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金融文化又被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决定，受制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在长期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中国的金融文化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融哲学和伦理。

#### 四、挖掘和发扬中国优秀金融文化：以中国传统义利观为核心的探讨

回溯历史，中国悠久的金融文化离不开古代经济伦理的深刻影响。义利观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义利范畴的论述对后世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伦理思想的源头，亦是贯穿于中国数千年经济伦理的核心范畴。尽管孔子“罕言利”（《论语·子罕》），但《论语》中还是记载了很多孔子有关“利”和义利关系的论述。孔

<sup>①</sup> 关于近现代私营银行的发展历程，参见王丹莉《银行现代化的先声——中国近代私营银行制度研究（1897—1936）》，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34—37页。

子及早期儒家学派关于义利方面的观点可以被概括为“义主利从论”。<sup>①</sup>即在义和利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义”，而“利”要服从于“义”。孔子并不否认“利”的合理性，但主张对“利”的谋取必须以符合一定的价值准则与伦理规范为前提。关于这方面孔子有很多精辟论述，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述而》）。孔子并不鄙弃富贵，“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以正当的、合宜的方式获得利益是值得肯定的行为，他所鄙视的是“不义而富且贵”。君子应当以社会价值准则与道德规范为行动指南，而不以自己的私利来破坏这种价值准则和规范。在孔子以及早期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中，“义”与“利”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他们主张和奉行的不是全面否定“利”的道德至上主义，而是倡导一切逐利的行为都应当建立在“义”的基础之上，不能损害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与道德观念。

孔子的义利观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见利思义”，这是底线原则。《论语》中多次出现“见利思义”（《论语·子张》）、“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义然后取”（《论语·宪问》）等类似的表述。“见利思义”即当一个人或企业面临利益时，应当以是否合于“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可以获得或占有这些“利”。一个正直的人或企业必须摒弃而不是利用可能会损害他人或社会道德准则的获利机会。这一原则不止适用于“私利”，即使追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等“公利”，同样也要遵循合于“义”、合于“道”的原则。在这一点上，孔子态度十分明确，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德政”“仁政”，倡导以正当的方式获得国家利益和振兴国家的“王道”，强烈反对为了一国利益不择手段的“霸道”“诡道”。在儒家学派的“义利之辨”中，不论是追求个体、集体还是国家的利益，“义”始终是基本前提，“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任何逐利的行为不能凌驾于社会道德准则之上，以此作为个体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化金融文化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二层是“义以生利”，这是更高的经济伦理原则，也是更积极的原则。“义以生利”这一命题意味深远。孔子并不否认人的正当利益需求和欲望，之所以“罕言利”，是因为在孔子的义利观中，“义”始终具有道德价值的优先性，在“义”的范围之外不能言利，任何人都不能违背道德准则而获利，而在“义”的范围之内则不必言利，只要符合“义”，就可以确保正当的“利”的获取。“‘义’以外的‘利’是‘君子’所不当言，‘义’以内的‘利’是君子所不需言——这就是孔丘‘罕言利’的秘密所在。”<sup>②</sup>

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义以生利”的观点同样包含深刻的合理性。在一个由各类行为主体共同构成的经济体系中，作为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义”，可以为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提供重要的基石。金融体系作为信用交易体系，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与参与交易者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密切相关，市场参与者的信任以及道德自律对于克服道德风险极为重要。<sup>③</sup>如果一个交易主体在实践中能够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与职业操守，不以“利”为唯一追求和目的，其社会信用和声誉会因此提升，从而积累珍贵的“社会资本”。从长远来看，这种看似无形的社会资本却可以为交易主体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和商业利润。例如，现代金融体系中的银行，如果一家银行能够诚信经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良好的社会声誉便会带来客户的信任，进而为银行赢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利润，“义”便可以生“利”。反之，如果没有对职业规范与道德准则的坚守，“利”也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对于企业来说，“见利思义”是消极的底线原则，而“义以生利”则是积极的商业原则。

① 赵靖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② 赵靖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③ 王曙光等《金融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7页。

秦汉以降迄于宋明,儒家传统义利观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敢于批判和矫正旧的伦理传统、肯定人的利益需求的功利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战国后期荀子强调“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司马迁基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提出了“善因论”。到了宋代,王安石更是将理财摆在了极其突出的位置,“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答曾公立书》)在王安石看来,为富国强兵、谋天下之公利而理财本身就是大义,其对于功利与仁义的观点呈现鲜明的时代特点。南宋时期,功利之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旗帜鲜明地反对贵义贱利的经济思想,他们更强调道德与功利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叶适等人重视富民、重视理财、反对脱离功利虚谈道义,但叶适、陈亮等人所谈的“功利”多指长远的、关乎国家富强的“功利”<sup>①</sup>,这种以“事功”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想也是时代的要求。

回溯历史,义利观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商业伦理与商业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富且“好行其德者”比单纯的富有更能赢得人们的认可。《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被中国人视为“治生”之祖的商人白圭。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史记·货殖列传》)。白圭认为,一个人如果“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史记·货殖列传》)就不可能学习他的治生之术,“智、勇、仁、强”在白圭眼中是商人必须具备的素质。白圭深谙“取”“予”之道,在他看来,要做到“仁”方可“能以取予”。只有很好地“予”,才能更多地“取”,“贪贾知取而不知予。夫以予为取,则其为利也大”<sup>②</sup>,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经营理念,这些经营理念至今仍难能可贵。

## 五、中国金融文化在近现代的继承、嬗变与创新

丰富而独特的经济思想与商业伦理是中国宝贵的经济文化与伦理遗产。钱庄、票号以及近代银行家实际上都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商业文化和经济伦理,从而在充满动荡的近代金融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其发展历程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金融文化也具有借鉴意义。

山西票号是中国近代以来颇具代表性的本土金融机构。票号开始于清朝道光年间,从异地汇兑起家,在19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成金融网络。经过一个世纪的积淀,山西票号形成了独特的经营文化,是近代金融史值得关注的思想遗产。票号文化特点如下:一是开拓精神与格局。在当时中国版图之内,北到蒙古,西到新疆,东到上海,南到香港,全国票号分支机构非常多。票号还奋力开拓国外市场,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都有山西票号的分号。山西票号早期经营者富有冒险与开拓精神,其商业版图包罗全世界。二是信用文化。票号资本实力雄厚且笃守信用、诚实无欺、轻财尚义,即使晚清时局动荡,山西票号各地的分支机构在面临经营困难之时仍坚持“凭票付款,分毫不短”,故能“信用益彰”<sup>③</sup>,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三是严格的人才选用与培养制度。山西票号注重道德信义,“故选用职员,教养同人,非常慎重”,学徒均需经过严格的遴选与训练、通过工作能力与道德的双重考核才能成为正式的员工。<sup>④</sup>对于职员的日常行为及生活,也有近于苛刻的明文禁律。山西票号为员工确立了道德信条“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sup>⑤</sup>,极其重视员工的道德品质。四是创新人力资本管理制度,明确员工的激励机制。在票号中,出资者可获得“银股”,出力者可获得“身股”。只要员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① 赵靖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0、第329页。

② 周振甫《〈史记〉集评》,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7页。

③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编《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7-619页。

⑤ 王曙光《金融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16-322页。

为票号服务达到一定年限即可获得身股，拥有身股和拥有银股的员工同样可以参与票号的收益分红。因此，票号内部员工“莫不殚心竭力”，“人人各谋其利，不督责而勤，不检制而俭”，<sup>①</sup>对人才的期权激励极大地稳定了票号的经营队伍。五是同舟共济的经营文化。山西票号靠地缘文化结合，靠地方精神纽带凝聚力量，在遇到危机或者灾难时，能够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共同度过危机，这也是票号能够在晚清时期应对各种金融风波的原因。

中国近代华资私营银行在金融文化方面的做法也值得今人借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重要的华资私营银行成长起来，“南三行”“北四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近代私营银行的崛起，与当时私营银行的文化以及优秀金融家的作用分不开。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出现的华资私营银行在内部治理、组织架构以及经营模式上都受到了外资银行的影响。和拥有政治经济特权且资本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相比，华资私营银行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在艰难的生存空间和激烈的竞争中，华资私营银行的企业文化也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开拓进取、勇于创新。为了拓展业务和市场份额，华资私营银行“不以利小而不为”，从外资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不屑于开展的小额储蓄业务做起，不断开发各种新产品，当时的华资私营银行推出了整存零付、婴孩储蓄、旅行储蓄、婚嫁储金等各种业务以满足或者“引领”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吸引了大量闲散资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就一直和自己的员工强调，身为银行业的从业者，“必须放开眼光，不断注意世界之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新趋势”，“必须终日孜孜，抉发种种新可能，在社会一般人士未思未觉之先，发出惟我独到之政策与业务”。<sup>②</sup>

第二，强烈的服务意识。金融业本质是服务行业，不论在何种条件下，“务求顾客之欢心，博社会之好感”<sup>③</sup>是银行力争达到的目标。“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微细，我宁繁琐”<sup>④</sup>，一些大的华资私营银行“以服务社会为使命，无论贫富贱贵，视同一律”，倡导“实现平民化，为多数平民服务”<sup>⑤</sup>，同时亦强调“银行在社会事业之立场，必须兼顾公共之利益……凡能有裨于社会建设者，虽薄利亦所不辞，否则，纵能博得厚利，不取也”。<sup>⑥</sup>和外资银行、钱庄相比，华资私营银行更愿意在细节上改进服务，这也是他们能够赢得个人以及企业客户的重要原因。

第三，重视信用、经营稳健。因为华资私营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来之不易，一些重要的华资私营银行在经营中恪守信用、风格偏于稳健谨慎。“银行经营，首重稳健，若意存侥幸，惟利是图，未有不趋于失败者”，因此“一切经营之方法，以资金安全为第一要义”。<sup>⑦</sup>对于存款，一些大银行会另拨资本专设会计独立的储蓄部，设立准备金，并定期公示相关账目及投资情况，杜绝风险性过高的投资，以赢得储户信任。对于放款，也“力求稳健主义……不敢稍事扩张”<sup>⑧</sup>。一些华资私营银行甚至会通过联合经营来为彼此的信用背书，同时也通过联营提升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第四，建立规范的人才选拔、任用和激励机制。不同于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银行选聘员工的方式更接近现代企业，他们以公开、公平的招考方式吸纳人才，而不是凭借地缘或亲缘关系构建自己的员工队伍。规模较大的华资私营银行招聘以考试为基础的，有明确的《行员任用规则》，也有宽口径的选才机制，甚至与专业院校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确保人才来源。很多华资私营银行通过等级差薪制、行员持股、行员储金等方式实现对员工的激励，增强行员的归属感，在员工晋升方面则任人唯

①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编《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86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0-871页。

③ 吴经砚《陈光甫与上海银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19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0页。

⑤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85页。

⑥ 金城银行编印《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刊》，1937年，第112页。

⑦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1-872页。

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8-191页。

“才”，而不论资排辈，“苟有优秀之才能，必予以相当之地位”<sup>①</sup>。这些经营理念与经营制度上的坚守与创新都为当时的华资私营银行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创造了条件。

## 六、结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拓中国特色金融现代化道路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经济思想与金融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宝贵的精神遗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见利思义”“义以生利”的儒家传统义利观，以及千百年来在这一土壤之上逐步演化而来的强调诚信、道义的经济伦理与金融哲学，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sup>②</sup> 金融体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也需要推动优秀传统金融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适应性和创新性发展转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发展方式和路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刘雅君

<sup>①</sup> 上海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sup>②</sup>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新华日报》2024年1月17日，第1版。